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黄宗忠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黄宗忠选集

—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黄宗忠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前 言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丛书编辑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检阅建国三十五年来图书馆学科研究的成果，总结和反映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成就的全貌，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学理论水平，由他们发起编辑、出版《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丛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不仅对图书馆学术研究者是一个鼓舞，而且对全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这个想法，当《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丛书编辑部向我约稿，由我目选一本论文集时，我欣然应允了。在此谨向贵刊编辑部表示衷心谢意！

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主要选自我一九五九年以来在国内外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我按照由近及远，保持论文一定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从中选择了十二篇，约16万字，大体可分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等三组。按照编辑部要求，全部论文保持原来面貌，未作任何改动。

由于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以及历史的原因和本人水平有限，因此原有文章中肯定会有某些不妥之处和它的局限性，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选集这个论文集时，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八一级部分本科生和八二级、八四级部分硕士研究生系统的阅读了我的全部或大部论文之后，提出了论文的选择目录，在此表示感谢！

黄宗忠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黄宗忠简历



黄宗忠 男 1931年10月生,湖南省涟源县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湖北省档案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湖北省档案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高级职务评审专家组成员,武汉信息与咨询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理事。

自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72年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1984年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73年9—10月以中国图书馆界代表团成员访美。1982年11月至1983年2月赴美国访问考察。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图书馆学基础和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79年开始招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生,1982年招收图书馆管理硕士研究生。1987年7月已有四届硕士毕业生共16人毕业,目前在校硕士研究生14名。三十年来从事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先后发表论文49篇,其中《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十五年来我国图书馆干部培养工作》、《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兼评文华图专和韦隶华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作用》等发表后均有较大影响、曾被译成日文、英文并发表在国外刊物上。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和《信息、知识、科学、图书》等论文，1985年先后获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奖。《图书馆学导论》一书受到国内图书馆界好评，先后有北京、上海、兰州、太原、合肥、广西、武汉、长沙等地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书评十余篇，影响较大。同时还有《图书馆管理》、《外国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资料汇编》三书已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教材编选计划，不久将分别出版。

目 录

前 言	(I)
简 历	(II)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	(1)
信息、知识、图书与图书馆	(17)
加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35)
试论变革中的中国图书馆	(53)
试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68)
建立和发展我国图书馆管理科学	(83)
试论我国图书馆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97)
论文目录	(111)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认真总结我国图书馆事业建国三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主要成就、经验与教训，对于加速实现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将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的实践，乃是实现重点转移的基础与出发点。通过总结不仅有助于我们今后在实现重点转移时发扬成绩，吸取教训，克服缺点，加速步伐，继续前进，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建国三十年来图书馆战线的是非弄清楚，进一步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否则我们也不可能实现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

怎样总结我们的经验，怎样评价建国三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呢？到底那些工作是做得好的，那些做法是有问题的呢？那些是基本经验，那些是教训呢？检验的唯一标准就是图书馆事业三十年来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循，图书馆战线也毫不例外。

一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出现过起伏不平的阶段，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旧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不仅是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而且家底是很微薄的，解放前的一九三六年是旧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最高的一年，全国只有图书馆5,196所，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只有图书馆391所。建国三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几十倍、几百倍。

首先，各种类型图书馆得到巨大发展，目前已达30万个以上。解放初期，我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83所，藏书总量1,600多万册，一九七五年达到624所，其中藏书100万册以上的25所，一九七八年全国公共图书馆1,256所，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解放初期140多万册，一九七八年增至980多万册。高等学校图书馆一九五〇年为132所，藏书总量794万册，一九七八年增至598所，其中藏书100万册以上的有35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图书馆、分院馆、研究所图书室，一九四九年为17所，一九七九年达到130多所，藏书总量超过一千万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书由解放初期的33万册，增至400多万册。工厂、农村、街道、部队等图书馆（室）都有很大发展。

第二，图书馆不网断得到发展和健全。一九五六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就提出“全面发展，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密切联系”的原则。一九五七年国务院第57次会议通过和批准了《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组成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的图书小组，相继建立了北京、上海全国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沈阳、武汉、广州等九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国家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下，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之间广泛开展了外文书刊的采购、图书调拨、联合目录编制、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馆际协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六六年以后被中断。近几年来又有一部分地区的协作组织已恢复，如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等地。集中编目、联合目录等全国性的协作工作也已恢复，并有

所发展。特别在一九七八年华国锋同志提出“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以后，图书馆网的建设得到更大的重视和进展。目前我国图书馆以系统图书馆网比较健全、完整，全国性、地区性的图书馆协作网不够稳定和完整。电子计算机存储、检索网络正在研究实验中。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支又红又专的图书馆干部队伍已成长壮大起来，这支队伍包括专业干部和业余积极分子两部分，人数很多，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估计全国图书馆专职干部在十万人以上。据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省统计，全省有图书馆专职干部三千人，吉林省统计，县市公共图书馆专职干部有七百五十六人。在十万以上的专职干部中，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函授生约占百分之三。图书馆干部队伍的迅速壮大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据一九七九年武汉地区七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统计，解放初仅有六十二人，目前达二百五十一人，增加了三倍多。不仅数量成几增加，政治与业务质量也不断提高。

第四，随着图书馆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与壮大，图书馆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有五十九年的历史，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在武昌文华大学设立了图书科，一九二九年创办了独立的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解放前的二十九年，在高等学校内设立图书馆学系科的还有南京金陵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上海国民大学等，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只剩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所。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数量有很大发展，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外，西南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都曾办过图书馆专业。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已有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等院校恢复或成立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一千人以上。建国三十年来，图书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进修生约

二千人，毕业和肄业的函授生一千二百五十人。此外，业余图书馆学校也培养了大批在职干部。短训班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一种主要形式，一九五九年就达三十万人次，建国三十年来，通过短训班培养训练的干部约达五十万人次以上。

第五，图书馆学研究方面已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体系，特别在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图书馆目录、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目录学等方面比较突出。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先后编制了《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新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汉语主题词表。遵照周总理的遗愿，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正在积极编制。

第六，在图书馆技术改革和现代化研究方面已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图书馆的技术改革从一九五八年就已开始，当时主要在图书加工的工序和技术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一九六〇年以后，进一步就图书馆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和频繁的手工操作方面进行革新，如图书在书库运送、传送索书条、油印卡片、手工排卡、打号码之类工作，进行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试验，并取得某些成绩，但由于有待进一步完善，没有推广使用。一九六四年以后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停止了。一九七四年有关部门开始了“748工程”的研究。目前有许多单位正在组织人力就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缩微复印技术、视听技术、图书馆建筑与设备、机器翻译等进行研究。有的采取土洋结合，对图书馆的某些操作程序进行了改革，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第七，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在保存文化遗产和利用馆藏图

书资料，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积极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为教学、科学研究服务，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配合这些工作编制了大量的书目、联合目录，举办了各种报告会，讲座、图书展览，流通了大量的图书资料。

二

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起伏不平的，是波浪式前进的。它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两个阶段、两次变革、四个时期。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的管理方法与传统的技术方法为主，也就是传统的图书馆时代，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基本上处于传统的图书馆时代；第二阶段，就是由传统的图书馆过渡到现代化的图书馆，也就是由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手工操作的传统技术过渡到现代化技术和传统技术并存的阶段。这一阶段，图书馆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图书馆组织网络化、工作标准化、技术现代化，在这一阶段中某些传统的技术仍然保留着。这个阶段，在国外称为“第二代图书馆”，它的显著标志就是以现代化技术为主，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跨向的阶段，正在经历着的阶段，世界先进的一些图书馆都经历了这两个阶段。

两次变革：一次是解放初期图书馆所有制的变革，我们把国民党时期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图书馆变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有，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我们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完成，它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次变革，就是技术方法上的变革，一是要

把传统的落后的手工操作技术逐步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来代替，使图书资料的采购、加工、存储、检索、借阅自动化；二是把传统的藏书形式——印刷品，逐步应用光学技术和声相技术使图书资料向缩微化、视听化发展。这一变革，已经开始。随着这一变革的实现，我国图书馆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

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稳健发展的时期，从1949——1957年，这个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是稳步前进、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首先对旧有的书馆进行了整顿改造，把旧社会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图书馆变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有，把四十四所私立图书馆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调整了藏书成分，充实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改革和废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顿了图书馆干部队伍，从而使旧有的图书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次，学习了苏联图书馆某些经验与技术，翻译了一批苏联图书馆学的著作，对当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由于我们在学习时缺乏具体分析，也给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带来某些问题。第三，各种类型图书馆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工会图书馆从无到有或从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七所，一九五七年发展到一百零一所，藏书达五百五十万册。一九五六年底农村图书室发展到十八万二千九百六十个，工会图书馆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六个。第四，为大众服务的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形式多样，效果显著。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积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

理的分配。”自周总理指示以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普遍得到了重视，各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并有明显效果。第五，图书馆之间广泛地开展了协作，先后建立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初步形成系统图书馆网和全国、地区性协作网。第六，图书馆学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活跃，出版的专业书刊与论文较多。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得比较快，存在的问题就是抓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抓晚了，本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五三年就着手抓，由于对此认识不够，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开始抓。结果造成图书馆工作被动，图书资料缺乏，影响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第二个时期是波浪式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58——1965年。这个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起伏的坡度很大，但仍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时期还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从1958——1961年，这一段图书馆员和干部的思想比较解放，基层图书馆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已达到473,800所；山西、吉林、黑龙江、宁夏等省、自治区图书馆相继建立起来；图书馆服务工作有很大改善，开门办馆、送书上门，变被动为主动，图书流通量显著增加；图书馆的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大胆尝试；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都有相应的发展。但是这一段，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一些同志思想方法片面、绝对化，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失去平衡，基层图书馆发展过快，国家和群众负担不起，得不到巩固，如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一九五八年47万多个，一九五九年就下降到28万多个。二是在图书馆的任务与服务对象上，提出“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注意了普及，忽视了提高；强调了为广大群众服务，忽视和削弱、有的甚至取消了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知识分子服务。三是在图书馆藏书的藏与用的关系上产生了混乱，失去平衡，片面强调藏书的使用一面和片面追求图

书流通量，提出“一切为了读者”，“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提高图书流通率，做到翻上加翻，翻了又翻”，忽视了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搜集、整理、保藏图书；强调“开门办馆，送书上门”，忽视了馆内的阵地工作。结果造成一部分图书丢失、缺藏、堆积，书库混乱，目录作用削弱，图书馆基础工作受到破坏。由于对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处理不够好，古籍与外文图书的收藏、外借都受到影响。四是在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上，由于强调“大破大立”，原有的一些正确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有的只破不立。五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上，由于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党的双百方针不能得到很好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得到很好落实。六是在图书馆干部培训上，注意了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忽视了业务技术上的钻研与提高，造成红专关系混乱。七是在思想方面，注意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但缺乏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结果出现片面性、绝对化和浮夸风。一九六二年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图书馆战线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方面主要作了下列工作：一是在事业的发展上，调整了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部分。二是在图书馆的任务与服务对象上，强调为广大群众服务与为科学研究服务两者都不可忽视，但可以有所侧重和分工。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如藏书建设、内部整理、目录体系的完整、规章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四是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注意馆内阵地工作与馆外活动相结合，整顿了读者队伍，提高服务质量与效果，流通工作既讲数量又讲质量，在为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强调“广、快、精、准”，重点服务，对口服务。五是在干部的培养上，注意又红又专，政治思想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大练基本功，举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和短训班。六是图书馆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七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由于贯彻了双百方针，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写出的

论文许多至今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由于“八字”方针的贯彻，从1962——1965年图书馆事业又出现了继续前进的大好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图书馆事业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66——1976年。林彪、“四人帮”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在图书馆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大搞“全面专政”，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把图书馆搞到取消和崩溃的边缘，使原来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事业的干扰与破坏，概括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全盘否定十七年的图书馆事业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否定图书馆的社会主义性质，污蔑图书馆十七年是“黑线专政”、“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乐园”、“封建藏书楼和全民图书馆的混合体”、“大放封资修毒素”。二是任意歪曲和篡改图书馆的性质、作用，以图书馆的阶级性代替图书馆的科学性、教育性、社会性、服务性、保存性，把阶级性当成图书馆唯一的性质，代替一切，否定图书馆性质的多样性；同时以阶级斗争和为阶级斗争服务代替图书馆的一切作用和工作，把抓阶级斗争和为阶级斗争服务当成图书馆的唯一工作，把图书馆抓业务建设，说成是“不抓纲”，把为阶级斗争服务代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代替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三是肆意篡改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在服务对象上大搞唯成分论，制造莫须有的“分工论”、“间接服务论”、“全民服务论”等罪名，挑动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把图书馆为工农兵服务与为知识分子服务对立起来，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生产、科学研究、教学服务对立起来，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为生产服务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为科学研究服务说成是“为资产阶级专家服务”，把为教学服务说成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四是把图书馆为保存文化遗产、人

类知识而收藏的图书资料，污蔑为“封资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政策、愚民政策，使大批有用的藏书在一段长时间内被封闭，不许流通，张春桥说什么“图书馆的书，别看它有几百万册，有用的只有两书架”。意思是说只有马列、毛主席著作有用，其他都无用。他们把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古籍、珍藏视为“四旧”、“毒草”、疯狂叫嚣要统统烧掉，结果有些地区大量书刊被烧被毁。五是破坏图书馆的藏书建设，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洋为中用”的方针，把外文书刊的收藏通通斥之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许多图书馆的外文书刊采购被终止，外文连续性刊物被中断，搞得藏书体系残缺不齐。六是破坏和摧残图书馆干部队伍，歪曲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反对钻研业务，把工作踏实、刻苦钻研技术的馆员与干部打成“白专道路”他们混淆敌我界限，把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长期下放农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七是大搞无政府主义，反对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与科学管理，把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管、卡、压”，使图书馆长期无章可循，造成混乱。八是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被中断好几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是全面的严重的，图书馆战线是“重灾区”之一。

第四个时期，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图书馆迈进时期。这是一九七六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主要工作：一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端正思想路线。二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图书馆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三是进一步明确图书馆的性质、作用、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四是整顿内部，清理馆藏，健全目录，调整关系，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五是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网、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得到一定的